

田中外交及其背景 (上)

衛藤瀋吉作
陳鵬仁譯

——京奉線遮斷案的外交過程——

前言

田中(義一)政友會內閣，說是爲了對中國確定所謂「積極策」而大大宣傳的東方會議，舉行於一九二七年六月二十七日，結束於七月七日。而開完此項會議以後，其所採取對華積極策的具體案就是遮斷京奉線案。當時，張作霖在北平，其主力部隊進駐關內，因此京奉線是關內奉天軍的重要補給線。而且，最重要的補給基地奉天城，和東洋最大的兵工廠都在滿鐵線的東邊；而京奉線自出去奉天城西邊門外的瀋陽車站不久，便要走滿鐵線的下面。所謂京奉線遮斷案，就是擬在這個地點，援用滿鐵線附屬地的行政區，以遮斷京奉線的軍事補給爲藉口，企圖一舉以解決滿蒙懸案者。

本文的目的是，擬試述此案的產生至消滅的經過，並說明田中內閣的對華外交雖然是積極外交，但它爲什麼不能達成其所謂積極策的理由。

第一節 有關遮斷京奉線案的呈報意見

一、中國內戰的演變

田中政友會內閣成立於一九二七年四月二十

日。在在野黨時代，以第一次若槻(禮次郎)內閣的所謂幣原(喜重郎)外交爲無爲無策，而大肆攻擊的政友會，亦如馬場明氏所說(註一)，在本文後面亦將提到，掌握政權以後，遂發覺中國的事情，自非所謂積極策所能解決。於是，田中新內閣對北伐的方針，迨至五月中旬，似繼承着幣原的不干涉政策，但如後面所說，在五月二十四日的內閣會議，它却忽然決定出兵山東。其目的是，從撤回保護主義轉變到現地保護主義，以保持田中內閣的「面子」。

五月中旬，張作霖的屬下，張宗昌和孫傳芳的連橫又有進一步的發展。在政治上完成調整的北軍，遂乘南方的蔣介石反共南京國民政府和以汪精衛爲首之容共武漢國民政府的分裂，意圖大舉南下。對於北軍的這種企圖，蔣介石南軍曾予反擊，尤其在津浦線上李宗仁麾下的南軍，大破張宗昌、孫傳芳部，五月二十二日佔領蚌埠，繼而進佔宿州，大有一舉北上，攻取徐州、濟南之勢。在另一方面，進兵中原洛陽的馮玉祥西北國民軍，與李軍相呼應，東進佔領京漢、隴海鐵路交叉點鄭州。迨至五月底，津浦線上的徐州失陷，對付馮軍的張學良麾下的第三方面軍，因主要將領的背叛而崩潰。由此，張學良被乃父張作

霖追究打敗仗的責任，同時被免去方面軍團長的職務，悄然歸燕，終以得病爲由而住進醫院(註二)。

(註一)馬場明「第一次山東出兵與田中外交」(「亞細亞研究」第十卷第三期，一九六三年十月號)五〇—七頁。

(註二)一九二七年六月四日「大阪每日新聞」。

二、日本外務省的諮問

爲了因應時局的激變，日本外務省於六月二日，秘密地對駐北京公使芳澤謙吉和駐奉天總領事吉田茂，就奉天派如果戰敗時，張作霖的命運將會如何，日本應該採取的政策，而做了大約如左的諮問。(註一)

在目前，南軍如果佔據華北時，其中縱令有些共產黨同路人，日本政府也祇有默認北京政權。

(一)如果張作霖戰敗亡命時，可能由與南方能夠妥協，較比懂得思想的人來維持東三省的治安，若是，這個人將是誰？

(二)如果張作霖收拾奉天軍，撤到關外時，居

於南方派與奉天派之間，爲安定東三省的政情，日本應該採取什麼態度和方針？

(二) 在華北南北兩軍決戰的餘波，如果波及東三省，且陷於不可收拾的狀態時，日本應該採取什麼態度和方針？

(註一) 田中—芳澤，六月二日發出，外務

省縮影軟片，P.V.M. 41, pp.

11-14.

三、芳澤和吉田的回答

芳澤回答的要點大約如下。關於第一個問題：沒有比張作霖更適當的人；關於第二個問題：對於中國的政爭最好不要斡旋，但如果南方對東三省進行攪亂工作，可採取進一步的措施；關於第三個問題：可以像一九二四年第二次奉直戰爭的時候，對於南軍提出有關維持滿洲治安的嚴重警告，並採取行動。(註一)

六月十日，到達日本外務省的吉田的回答，與芳澤者有些不同。關於第一個問題：張作霖行動敏捷，眼看危機，勢將隻身衝出北京，逃回東三省，萬一來不及逃，東三省軍閥中最機警而狡猾的吳俊陞將取而代之；關於第二個問題：禁止軍閥使用京奉線於軍事，鞏固關東州和鐵路附屬地，以防止南方便衣隊入侵滿洲，如果形勢更趨惡化，可採取收押並管理在滿洲的俄國和中國鐵路的手段；關於第三個問題：希望與列強共同對南北兩軍，強制其停戰。(註二)

(註一) 芳澤—田中，六月十日寄達，外務省縮影軟片，P.V.M. 41, pp. 15

— 26 .

(註二) 吉田—田中，六月九日寄達，同右，pp. 27—31.

四、吉田第二個提案

上述六月九日到達的回答，我們姑暫把它叫做吉田第一個提案，六月十日到達日本外務省的吉田公電(註一)，我們稱之爲吉田第二個提案。

吉田第二個提案，不僅要由列強共同佔領滿洲，而且還要佔領華北的要地。換句話說，吉田建議，爲了使華北的動亂不波及滿洲，可以根據義和團最後議定書，控制北京一帶與海岸線的交通，並令南北兩軍都不能利用京奉線，同時提出維持滿洲治安的具體方案。

在第一個提案，對於它簡單說的「如果形勢更趨惡化，收押管理在滿俄華兩鐵路一時的機宜手段」(註二)，在第二個提案，則去掉俄國鐵路而這樣說：

「……如果有人擾亂滿洲治安的時候，表明將以日本陸軍暫時佔領山海關洮南、吉林等中國鐵路的主要地點，使中國軍隊完全不能使用管理該項鐵路，必要時將查封奉天兵工廠，不許軍閥私用而擾亂東三省治安的決心，俟他日東三省的掌權者確定後，再以歸還上述所收押鐵路爲條件，以採取實現有關我對於開發滿蒙的措施。」(註三)

又，吉田所提及義和團事件最後議定書，是指其第九條。它說：

「……爲了維持首都與海濱間的交通自由，清國政府承認各國有經相互協議決定佔領各地點的權利，亦即各國所將佔領的地點爲黃村、廊坊、楊村、天津、軍糧城、塘沽、蘆台、唐山、灤州、昌黎、秦皇島及山海關。」

不特此，對於外務省的第三項質問，吉田第二提案具體地做了這樣的答覆：萬一南北軍閥不聽列國的停戰要求，應以列國的軍隊佔領津浦線、京漢線、膠濟線、京奉線、滬寧線等鐵路的兩端，從而管理奉天、漢口、漢陽、上海等地的兵工廠，和禁止輸入武器。

不過，這些提案都是以維護滿洲和華北的治安爲目的，吉田從沒提到擴大權益或分開滿洲等事。他使用着「爲中國的治平，我認爲可以干涉」(註四)，「政權之歸於何人，該悉聽中國輿論的向背」(註五)等字眼，因此在主觀上，吉田始終以維持治安爲其目的。上面吉田所建議要由列強共同佔領華北要地，強制管理兵工廠，實行禁止輸入武器等等，無非是爲了除去軍閥私用的物質基礎，從而以謀求中國國內政情的安定。

(註一) 吉田—田中，六月十日寄達，外務省縮影軟片 P.V.M. 41, pp. 32-37.

(註二) 吉田—田中，六月九日寄達，同右，p. 29.

(註三) 同右，pp. 33—34.

(註四) 同右，p. 36.

(註五) 同右，同頁。

五、吉田變更決心

可是，中國的政情並沒有照吉田的預測演變。第一，以為即將垮台的張作霖政權，並沒有馬上垮台。日本的進兵濟南，給予南軍的北上以無形的壓迫。（關於日本政府首腦之進兵濟南並沒有阻止北伐的意圖，而祇在現地保護其僑民一點，我擬另找機會敘述，但其進兵濟南的結果，竟限制了南軍的戰略行動却是不可否認的事實。）加以南軍補給線的大為延伸，武漢政府軍沿着長江東進，遂由西方開始威脅南京政府的統治區域。乘南軍氣勢稍微減退時，在北京的張作霖便積極從事南北妥協和停戰的工作，在山西本來準備中立的閻錫山，也自告奮勇出來做南北妥協的橋樑。因此，北京的張作霖政府遂得喘一口氣，而似不必由北京逃回奉天。

其次，六月四日，美國脫離了駐北京日本、英國、美國、法國和義大利五國公使所一致通過之南北和議的勸告。是即一時曾派一千八百名海軍陸戰隊於京津地區的美國（註一），突然變更其政策，決定縱令戰禍波及於京津地區，也不參加共同防衛，而將撤退其軍隊和僑民（註二）。至此，列強的步調遂不一致，所以不可能共同出來干涉中國內政。由之，吉田遂變更其方策。

（註一）一九二七年六月四日「時事新報」

（註二）一九二七年六月十日「東京日日新聞」。

六、吉田第三個提案

我相信，吉田必定這樣想：如果張作霖沒有垮台，在相當期間內戰亂不會波及東三省的話，應該變更方針，以張作霖政權為對象，利用張作霖陷於困境的今日狀況，以解決懸案。

亦即第二提案兩天後的六月十二日，日本外務省三度接獲吉田的意見。（註一）

根據吉田的說法，奉天官方之所以不聽日本的意見，乃是「由於年來日本對華態度不徹底的结果，奉天官方不知我方之可怕」（註二）所導致，因此吉田認為，日本必須出於能制對方死命的手段，以表示日本斷斷然的決心。

所以，對於如後面所將提到的帽兒山分館問題，當他訪問漢城的時候，便希望朝鮮總督（齋藤實）越過圖們江，日軍出兵中國，以「行軍」。對此，齋藤總督認為「以這樣小小事件而出兵國外實在不好」（註三），因此吉田遂不得不撤回他的提案。可是，在這個第三提案，吉田却主張包括其他鐵路案件，以鐵路案件為主，以帽兒山分館為副，尤以遮斷京奉鐵路通過滿鐵附屬地部份為總的王牌，由他親自來交涉，「以它為本官與莫省長之間的問題，令省長負其全責」（註四），以一舉解決滿蒙的懸案。又，所謂莫省長，就是奉天省長莫德惠的意思。

（註一）吉田一田中，一九二七年六月十二日寄達，外務省縮影軟片 P. V. M.

23, p. 34.

（註二）同右，三四頁。

（註三）同右，同頁。

（註四）同右，三六頁。

第二節 日本的對張作霖政策

一、對中國政策的混亂

如衆所周知，張作霖之所以有今日，完全是由於日本直接間接的庇護。譬如在俄日戰爭中，綠林小頭目張作霖曾被日軍逮捕並將槍斃，這時為他請命的是井戶川辰三和田中義一。其所以為張請命，固然是由於當時日方短少騎兵，很想利用張的馬隊所致，但救了張一命却是事實。

俄日戰爭以後，對於日本政府來講，保護其在滿洲的權益是對華外交的關鍵，因此，不管是什麼政權，祇要是能夠保護日本人在滿洲權益的政權，亦即建立擁有維持滿洲治安的實力，而且具有遵守條約的意志和能力的政權，遂成為歷代日本政府的重要課題。

可是，對於中國怎樣滿洲纔會安定的具體方策，日本政府本身却始終沒有很明確的方針。這正如一九一六年，當時的外相本野一郎所慨嘆。他說：

「觀看近年帝國政府對中國所採取政策，有非常不得其當者。不確定對華方針而或欲維持其帝政，或想幫助民黨以排除袁世凱，或同時援助民黨和保皇黨，嘴上喊東洋的和平，但反而造成中國的混亂，陷其於不可收拾的狀態的嫌疑」（註一）。

（註一）外務省編「日本外交年表及主要文

書」，一九五五年，日本國際聯合協會出版，四二三頁。

二、宗社黨事件

本野批評的對象，宗社黨事件無疑地是其中的一個。詳而言之，起初，日本政府認為，爲中止袁世凱的帝政需要加以壓迫，因而準備援助反袁運動。爲了幫助南方的革命勢力，遂把當日被認爲陸軍的第一個中國通時任旅順要塞司令的青木宣純中將調派爲參謀本部付，加上松井石根中校，令其到上海。(註一)這是一九一五年年底的事情。與此同時，在北方却決定援助策劃復辟清朝的宗社黨，並令土井市之進上校和小磯國昭少校等人參加其舉兵。至此，辛亥革命後即時唾棄清朝，拚命爲袁世凱賣命的張作霖的命運，遂且夕不保。是即對於日本政府，爲了保護權益，地方軍閥張作霖的休戚，當然不值得一顧。在舉兵之前，參與宗社黨的三村豐，持炸彈衝進正在陶着奉天城內馬路的張作霖馬車，而五體四散。所幸，張作霖沒坐那輛馬車，纔倖免於難。(註二)

惟由於南方革命派的舉兵沒就緒，南北策應的本來計劃因而不曾實現；如果北方單獨舉兵，可能促成袁世凱和革命派的妥協，從而鞏固袁世凱的地位；以爲一九一六年六月六日，袁世凱被阻止帝政而悶死之後，宗社黨的舉兵已經失去意義；以及日本政府內的部份人士一直有援張的想法等等因素，日本援助宗社黨的計劃，遂雲消霧散。(註三)

由於日本方針的突變，張作霖終於消滅了巴布札布的宗社黨軍，反而鞏固他在滿洲的地盤。從此以後，張作霖遂成爲滿洲最大的權力者，而令日本除加強和安定張作霖政權以外，沒有第二條路可走。

(註一) 對支功勞者傳記編纂會編「續對支

回顧錄」，東京大日本教化圖書公司出版，一九四一年，下卷，八九二頁。高倉徹一「田中義一傳記」，東京，田中義一傳記刊行會出版，一九六〇年，上卷，六二九頁。

(註二) 葛生能久「東亞先覺志士記傳」，東京，黑龍會出版，一九三六年，中卷，六三四頁以下；下卷，六六九頁。對支功勞者傳記編纂會編「對支回顧錄」，東京，東亞同文會出版，一九三六年，下卷，一三五—三五五頁。

(註三) 栗原健「第一次第二次滿蒙獨立運動」，收於日本國際政治學會編「國際政治—日本外交史研究，大正時代」一書，東京有斐閣出版，一九五八年八月，五二頁以下。

三、援張政策

於是，遂壓迫奉天方面聘請日本軍人爲顧問。這一方面意味着奉天軍的日本化和傀儡化，另一方面，也具有欲急速地現代化和精兵化奉天軍的意圖。原(敬)內閣決定對中國禁止輸出武器

，並很認真地履行了這個政策，但發現在第一次奉直戰爭奉天軍慘敗，張作霖需要武器時，它却積極地援助建設奉天兵工廠。日本政府認爲，這樣既不違反禁止輸出武器的一般方針，而又能加強奉天軍的實力。

如此這般，迨至大正末期(一九二四年左右—譯者)，奉天派便成爲中國的具有頭等實力的軍閥政權。

如上所述此護奉天政權的方針，其內容雖然有些抽象，但於一九二四年五月，清浦(奎吾)內閣的外務、陸軍、海軍、大藏四省所協定的「對支政策綱領」便這樣說：

「對於目前東三省的實權者張作霖，將按照既定方針繼續予以善意的援助和支持其地位，但應該注意不要因此而影響到我對中國全盤的利害關係，與此同時，要對張經常予以適當的指導，令他明白其所以有實權，完全是以(日本)帝國對滿蒙的實力爲後盾，俾令其對我始終持有善意的態度。」(註一)

(註一) 前述「日本外交年表及主要文書」，下卷，六二頁。

四、東三省的維持治安

依照上述綱領的方針，於同年秋天勃發第一次奉直戰爭之際，日方會對奉、直兩軍警告說：「……在滿蒙地方居住的(日本)帝國臣民達數十萬以上，日本的投資和企業也很多，尤其帝國本身的康寧與該地方的治安秩序，關係頗大云云」。(註一)

其次，對於一九二五年郭松齡的叛變，關東軍司令官曾經警告說：

「……有危害或毀損帝國的重大權益之虞時，本軍因為職責上不能默視……如果不幸如上的危險迫近時，本司令官當然不得不採取必要的措施……」。(註二)

對於郭松齡軍席捲遼西的原野，大舉東進，勢將越過滿鐵線，且迫近奉天城時，關東軍司令官發表了有利於張而不利於郭的方針。它說：

「日軍禁止在南滿鐵路兩側以及沿線的終點大約二十華里（三里三分之一，十二公里）以內有直接的戰鬥行為，和可能擾亂我附屬地之治安的軍事行動。」(註三)

換句話說，奉天軍由於郭軍的聲勢喪失戰意，其要人爭先恐後地把財產運到滿鐵的附屬地，張作霖本身且正在準備亡命的時候，擁有絕對優勢之火力的日軍，遮斷了郭軍與奉天城之間的通路。由此，郭軍停止進攻，躊躇逡巡，張作霖軍因而獲得挽回劣勢的時間。是即發出上述頭項聲明是十二月八日，禁止在附屬地附近有軍事行動的聲明出於十二月十三日，奉天軍騎兵奇襲郭軍，郭軍由之於十二月二十四日潰退，不久，躲在農民家的郭松齡夫婦被捕並被殺，其屍體被拋在奉天城外小河邊的公園。

惟我們應該知道，在當時，如上所述，日本政府的正式方針，是為保護其權益而要維持治安，在主觀上，它一直是努力於保持不偏不倚的態度。但與此同時，日本所扮演的客觀上角色，從結果來看，不但庇護了張作霖，而且因為張作霖

方面的哀訴懇求，關東軍為其提供了火砲，並令日本預備軍人操作這些火砲，積極地援助了張軍。這是多年來被詬病為滿洲四頭政治（譯註一）所導致的結果，也是日後雙重外交之弊端的一個因素。(註四)

(註一) 外交時報社編「中國及滿洲關係條約及公文集」，東京，外交時報社，一九三四年，八一—一四頁。

(註二) 同右，八一—一四頁。

(註三) 同右，同頁。

(註四) 栗原健「關東都督府問題提要」載於「國史學」創立五十周年紀念特集號，一九六〇年三月）一九一九二頁。江口圭一「郭松齡事件與日本帝國主義」(「人文學報」第十七號，八六頁)。與上述對張政策的同時，當滿洲的治安頻於危殆的時候，日本政府都增派了軍隊。這些隨時之增兵，究竟是為了什麼，到底發生了些什麼作用，其真實有待於今後的研究所。

(譯註一) 所謂四頭政治，就是由日本外務省、關東軍、關東廳和滿鐵四個單位作主的政治。

五、反對進入關內

在另一方面，日本一直堅決反對並拒絕援助張作霖進入關內。這是基於以下兩個原因。

一、張作霖如果企圖進入關內，由於日本和

張作霖多年來的關係，革命派、直隸派等反奉各派以及英、美等列強，一定會誤解其背後有日本的野心，基於這種誤解，而將產生排日運動，或與列強之間引起不必要的摩擦。這是它反對的第一個論據，而將這種論據說明得最清楚的，則莫過於第一次奉直戰爭當時高橋是清內閣所做的決定。它說：

「……如果奉天軍獲得勝利，張作霖在北京左右中央政局的話，反張派和外國輿論將以為其背後有日本的援助，這將為排日提供最好的材料；而事實上沒有獲得我支援的張作霖，不僅對我沒有好感，而且根據過去的經驗，其老獪或將利用其權勢，背地裡宣傳排日以為驅逐我勢力的方法；如果張作霖敗竄的結果，吳佩孚左右中央政權的時候，人們會以為受日本援助者打敗，進而侮蔑日本，與此同時，吳佩孚更將採取英美的政策……因此，帝國政府自不得不採取慎重的態度。

我對華政策的根本原則是，我國對中國內政採取絕對不干涉主義，對任何勢力保持不偏不倚的態度，逐漸期待中國國民的覺醒和向上，尤其在今日，遵照華盛頓會議條約及決議的精神而行動……」。(註一)

這項閣議決定說明了日本政府立場的困難，以為在張作霖背後有日本，吳佩孚後面有英美這種誤解相當流傳的今日，此種傾向如果繼續下去的話，奉直戰爭很可能變成日本和英美的對立。因此以為，「不能忍受其對大局之不利影響。」(註二)

爲了消除這種誤解，是項閣議同時決定：(1) 日本應該自動地與以英美公使爲首的北京外交團採取共同行動；(2) 令做張作霖顧問的，或者與張作霖關係深的軍人，不得參與這次時局。

二、日本政府希望張作霖維持東三省的治安。從張作霖的實力來說，日本不希望張作霖具有進入關內的「野心」，並認爲張的這種野心是會失敗的。一九二二年的內田康哉外相訓令充分說明了這一點。它說：

「祇要張作霖維持其勢力下之東三省的治安，專心努力於和平政策，他便可以在東三省獲得穩固的勢力，惟一旦依其武力將其野心延伸到中央，意圖以武力來統一或遠征，其結果必歸於失敗，這可以奉直戰爭爲證。……爲了張作霖和東三省的治安，我將繼續保持『阻止』張作霖遠征中央的態度。張作霖之努力於維持東三省的治安，不僅對他本身有利而幸福，更是對滿蒙具有複雜甚深之利害關係的日本所最希望者，因此，日本對張作霖在東三省的和平政策，將以同情態度處之，並將予以盡可能範圍內的援助。……惟所謂日本對東三省和平政策的援助或同情，日本與列國因爲約束而不能給與者，譬如提供武器，除非獲得有關列國的承諾不能提供，自不待言。」(註三)

基於上述兩個理由，日本政府一直反對張作霖插足關內。(註四)但是，張作霖本身却念念不忘要踏進關內，遂於一九二六年與其宿敵吳佩孚謀和，攻擊控制京津地區的馮玉祥系諸部隊，並把他們趕到西北，奉天軍由之大舉進入關內。

且將其麾下改稱安國軍，並遷居北京的張作霖，其如何得意，不難想像。他在表面上雖然裝沒什麼，但在其內心，他很可能自比爲漢高祖或明太祖。

(註一) 前述「日本外交年表及主要文書」下卷，二二—二三頁。

(註二) 同右，二三頁。

(註三) 同右，三一頁。

(註四) 以上所述，乃就日本政府的正式決定。至於有關這種正式決定背後的種種，池井優「第一次奉直戰爭與日本」(收在「英修道博士還曆紀念論文集編集委員會編『外交史及國際政治的諸問題』東京，慶應通信發行，一九六二年出版)，與其「第二次奉直戰爭與日本」(「法學研究」，第三十七卷第三號)有詳細的說明。

第三節 對張警告及其背景

一、松岡的觀察

正如在上面所引述文件裡日本政府所慨嘆，張作霖的確不是甘爲日本驅使之單純的所謂傀儡政權(註一)。至少，從大正末期到昭和初期是如此。所以，當日方提出所謂二十一條要求，以及爲了維持和確保因爲其他諸條約所獲得的權益，而說服張作霖時，便需要種種術數。這裡有能夠證明其一斑的松岡洋右私下對木村銳市談的紀

錄。它作於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十九日，題爲「滿鐵幹部與奉天當局的關係」，其要目如左。(註二)

(一) 滿鐵「始終採取儼然的態度，努力於抑制張作霖」，與此同時以「透過町野等從裏面來緩和它的態度」，以說服奉天官方和張作霖。亦即滿鐵採取了「有如車輛的兩輪，互相幫助，最後以達到我方要求的政略。」

(二) 最近，長大線等交涉之所以不順利，町野(武馬，張作霖顧問)與滿鐵理事大藏公望的感情衝突是近因。

(三) 町野對張作霖的影響，不是非常強(這是町野對在滿洲的日人所說者)，也不是完全沒有(外務省的見解)。但是，「至少對張作霖相當能責備其罪，大聲疾呼的還是町野。」

(四) 張作霖並不信任楊宇霆，町野在監視楊宇霆。

(五) 鎌田(彌助，滿鐵奉天公所所長)祇是張作霖的談話對手，因此，「像以往透過町野、鎌田由裡面運動，而在表面上採取斷然的態度以收效果的作法，在今日已經行不通。」

(六) 正因爲「滿鐵與奉天的秘密關係受挫」，所以每次交涉，吉田便感覺非常困難。

松岡的見解，大約如上所述，其所論雖然有些混亂，要之，以往，滿鐵和總領事表面上以斷然的態度交涉，與此同時，町野和鎌田私下進行說服，這樣互相配合得很順利的，在今日已經行不通了。當然，這並不是說人際關係的障礙是當時不容易交涉的唯一原因。譬如第一次世

界大戰後，中國民族主義的高昂，張作霖勢力的增長，也是使張作霖對日方要求確保和實現其權益不肯買賬的主要因素。但，映在松岡心目中的當時的人際關係如上的描寫，道破了滿洲四頭政治之弊端的一面却也是不可否認的事實。

(註一) 野村浩一「滿洲事變前的東三省問題」(日本國際政治學會編「國際政治—日本外交史研究，中日關係的展開」，東京有斐閣出版，一九六一年三月—七八頁。前述池井優的「第二次奉直戰爭與日本」。

(註二) 外務省縮影軟片 P. V. M. 23, P. 455.

一、吉田對張作霖的態度

如上所述，張作霖不聽日方的話之際，奉天總領事吉田茂便非常討厭張作霖。

吉田如何地討厭張作霖？其真假姑暫不談，我想介紹昭和初期流傳於奉天日僑之間的風聞。有一天，張作霖請吉田吃飯，照例滔滔不絕地說他的意見。剛硬的吉田，對鄰座的日本人，用日本話說：

「……這個混蛋……」

而笑咪咪地隨聲附和。

其次，一九二七年四月，田中就任首相的時候，張作霖本來準備派其部下趙欣伯前往東京為其祝賀的。吉田以為，張作霖以田中內閣的誕生對其有利，因而纔要派遣使節，因此認為這是「中國獨特的想法」，並對田中提出「在溫情之中

亦能以儼然的威容」對之。(註一)在這則公電，吉田說：

「對張暴政的非難，在滿洲不必說，連華北一帶都成為眾怨之府的今日，這是張之毫無忌憚地誇大宣傳與首相之關係的結果」(註二)。

被張作霖欺壓的北方民眾和以張作霖為敵的南方革命黨，可能因此而對日本田中內閣有反感，所以田中一組閣，吉田便主張由田中對張作霖：

「直接了當地表示以張作霖以往對內外的態度有物議為遺憾，同時以年來的友誼和同情勸告他儘快表明已知其昨非，以收反省之實」。

由此當可想見吉田對張作霖如何反感的一斑。

(註一) 吉田—田中，一九二七年四月廿一日到達，外務省縮影軟片，P. V. M. 30, P. 1055.

(註二) 同右，同頁。

(註三) 同右，十一頁。

三、木村對吉田的忠告

吉田對奉天當局所取態度之驕傲、峻烈，在當時好像很出名，因此幣原的親信，亞細亞局長木村鏡市曾經很客氣地對吉田勸說：

「從滿洲來的風傳說，關於專照單問題，莫省長之不講道理姑暫不談，貴台對莫省長那麼嚴厲，或將對中國有所影響，因聞及此事，特供參考。」(註一)

吉田這種態度，以後還是沒改，所以，奉天當局對吉田也就沒有好感。日後，楊宇霆就吉田對奉天當局的態度，曾經對北京的駐華武官本

庄繁說：

「簡直是對屬國的態度」。(註二)

(註一) 木村—吉田，一九二七年三月二十四日私信，外務省縮影軟片，P. V. M. 23, P. 21.

(註二) 本庄—南(次郎，參謀次長)，一九二七年八月九日寄達，外務省縮影軟片 P. V. M. 23, P. 201.

四、所謂滿蒙的主要懸案

由於張作霖不聽日本的話，因此，日方與奉天政權之間，遂產生所謂滿蒙懸案的案件。本文雖不以分析懸案的內容為目的，但為幫助瞭解其背景，特將其簡述如左：

(1) 打通線的敷設問題

張作霖政權於一九二五年八月，完成了打虎山與新立屯間的鐵路建設。對此，日本認為這違反了一九〇五年「關於滿洲之中日條約附屬規定」第三條。換句話說，清國方面約定在滿鐵線附近不敷設與其併行的鐵路，或建設有害滿鐵利益的支線，而日方認為，打虎山與新立屯間的鐵路就是與滿鐵併行的鐵路。因此，自一九二六年八月以來，一有機會，日本政府便提出抗議，但奉天當局不特不聽，而且於一九二七年一月間建設了新立屯與彰武間的鐵路，同年八月當時，更再架設彰武與通遼間的鐵路。

(2) 吉海線的敷設問題

吉林省政府於一九二六年秋天，發表了海龍、吉林間的鐵路敷設計劃。但在這以前，亦即於一

九一八年，日本曾經與北京政府簽訂「關於滿蒙四鐵路之交換公文」，約定以日本的貸款來建設這四條鐵路。而吉林、海龍間的鐵路就是其中的一條。所以，自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以後，日本政府便不斷地向奉天政權提出抗議，因為在當年，吉林省政府乃在張作霖控制之下。而一九二七年當時，中國當局仍然無視日本的抗議，照樣購買器材，繼續準備其建設。

(3) 不當課稅的問題

最近在華盛頓簽訂的九國條約，規定將召開有關中國關稅會議，以決定增加二分五厘的關稅。惟日後在北京舉行的關稅會議，由於列國的步調不一致，而未能達到結論；加以因為內戰，北京政府開始動搖，會議由之停頓。在另一方面，爲了獲得財源，廣東的國民政府竟在其統治下的港口，強制增加二分五厘的關稅；因此北方各地的軍閥政權也相繼這樣做。對此，包括日本，列強提出了強硬的抗議，但中國並不屈服，且在不了了之的情況中造成既成的事實。這在東北也不例外，日方因而不得不繳納附帶抗議的關稅。

此外，對於東北各地日本人所課的幾種稅，日方也以爲是違反條約的不當課稅，而一直在抗議。

(4) 盛京日報的查禁問題

一九二七年六月十日，奉天軍司令部以刊登誹謗奉天軍的文章爲理由，查禁了盛京日報。該報是日本人所發行的中文報紙，因此日方認爲它應享有治外法權的特權而提出抗議。從條約的解釋這個觀點來說，日方的解釋是正確的，但奉天

省政府却以爲這是北京的外交部所應該處理的問題，中國外交部則認爲這是地方的問題，亦即是奉天省政府所該處理的問題，而一直在拖。

(5) 帽兒山分館的開設問題

帽兒山位於鴨綠江中游東北地區，其附近住有三萬多的朝鮮移民，因此，渡江的交通事業，便隨朝鮮人的遷移而逐漸發達。一九二七年三月，日方提出希望在帽兒山開設安東領事館分館的要求，並獲得外交部長王蔭泰和奉天省政府的實力者楊宇霆的同意。於是於四月十六日，日方副領事田中作抵達朝鮮的中江鎮，一再要求與對岸東北方面的臨江縣知縣會面，但都被拒絕。恰好遇到換知縣，因而於五月二十二日，對新知縣提出見面的要求，但這也被拒絕。

五月二十九日，田中攜帶護照，渡江到帽兒山，但中國方面却官民聯合起來，將田中一行逐出國境，並破壞分館用的建築物。田中以公文提出抗議，但知縣沒有給任何答覆。從此以後，反對設置分館的運動，遂變成群眾運動，它更迫害朝鮮人，兩岸的交通，由之遂中斷。

張作霖所統治的北京政府，以當地的民心激昂爲理由，主張延期分館的開設。日方認爲，煽動群眾的是奉天政府當局，因此它應該負責收拾處理這個局面，以便照預定開設分館，而與中國官方對立。

五、對張警告案

對於張作霖的這種作法，當然日本政府並沒有保持緘默；是即對奉天當局，一有機會，便促

其自重，並勸告和警告其要用心於元實內部。(註一)

至於其詳細內容，雖不得而知，但於一九二七年六月廿二日，在外務省召開的東方會議籌備會議滿蒙委員會席上，上述的對張作霖的警告，曾經成爲話題。綜合出淵次官、吉田總領事、木村亞細亞局長的說明，其大要如左：

「本件警告係要友好地忠告這對張作霖本身，和東三省的保護安民，產業開發諸政的整理非常需要，如果張作霖接受這種忠告，對於產業開發諸政的整理等要求日本協助的話，日本將予以好意的考量，在並沒有附帶日本各種要求迫其接受這一點，它與二十一條要求根本不同其趣旨……」。(註二)

根據當時亞細亞局第一課首席事務官柳井恒夫的回憶(註三)，對於張作霖的勸告和警告，於一九二六年春天，亦即成立田中內閣的大約一年前，當時的幣原外相便有這種想法：亞細亞局第一課曾經作了「對張警告一件」的文件；這時已經在考慮使用遮斷京奉線這張王牌，惟因幣原外相很慎重，而還沒把它付諸實施之前內閣便瓦解。

但根據另外一項資料，我們間接地可以知道遮斷京奉線案，乃於一九二六年三月左右，已經由內閣會議所決定。(註四)幣原在內閣會議獲得這張王牌以後，眼看中國國內政治狀況的流動不息，而似乎不欲以這張王牌來和張作霖交涉。是則幣原一直注視着中國的內戰，以等待着它的結果。

(註一) 作者不詳「關於滿蒙的政情安定及懸案的解決」，外務省縮影軟片 P. V. M. 41, p. 176.

(註二) 外務省縮影軟片 P. V. M. 41, p. 224-5.

(註三) 一九六四年四月八日，在中央大學舉行的國際法學會春季大會席上的談話。

(註四) 吉田—木村，一九二七年八月十八日寄達，外務省縮影軟片 P. V. M. 13, p. 704.

六、吉田的對滿蒙方策

上述吉田之反映第二線的着急情形的對張積極方策，與幣原之觀察整個中國的不干涉的靜觀方策是有出入的。因此，在幣原外相底下，吉田或許覺得他自己並沒有受到應有的重視。套句典故，吉田的經世方策不為上司所容，「道輒軻而未遇，鬱抑而不伸」。

這時更換內閣，而出現了標榜積極方策的田中政友會內閣。所以，吉田遂於四月廿一日，將其對滿蒙方策，簡單扼要地寫給木村亞細亞局長。其要點如左：(註一)

(一)「不問鐵路附屬地的內外，滿洲的治安，在能力所及範圍內，應由日方來担任」。

(二)「乘奉天鈔票的暴跌和經濟界的不景氣，而因勞農或南軍唆使而罷工，我官警應該予以強壓」。

(三)「我之經營滿洲，應以帝國的國力行之，

不能依靠張(作霖)、楊(宇霆)或王(永江)來行事；無論什麼時候，絕不可以玩弄小策」。

(四)「經營滿洲的要諦，在於東三省的鐵路政策和貨幣政策，因此，當以俄中日的鐵路為整體來構想其聯絡組織，想出貨幣制度的妙案，在東三省設法獲得實施以上兩案的機會」。

上述之吉田的基本方針，經過兩個月左右的思索，而變成本文第一節所說的吉田第一提案和第二提案。

(註一) 吉田—木村，一九二七年四月廿一日私函，外務省縮影軟片，P. V. M. 23, p. 2355.

第四節 早期田中內閣的中國政策

一、田中外交早期的靜觀方策

在野的政友會，以幣原外交為無為無策，而攻擊說「帝國因不干涉主義放任一切，就是放棄帝國的權益」(註一)，並一直主張「必要時，站在自己見地，與列國協力，以採取適當措施亦所不惜」。(註二)

可是，一旦拿到政權，事情却不那麼簡單。因此，繼承幣原外交的所謂不干涉政策，和政友會所標榜的積極方策，以很奇妙的形式，不和諧地同時並存。

亦即田中組閣以後一段時間，與在野黨時代的聲明相反，非常地安靜。

(一)特派山梨半造到北京，勸告張作霖放棄關

內，專心於東三省(註三)。

(二)四月廿六日，拒絕英國要求日本在京津地區增兵。

(三)五月三日，對英國大使重新表示沒有意思增遣兵力(註四)。

(四)五月六日，在第五十三屆國會，田中對於野黨新黨俱樂部永井柳太郎的質訊答說：「我一直認為出兵要慎重」(註五)，而獲得東京朝日新聞「這就跟幣原外交沒有什麼兩樣」(註六)的讚譽。

(註一) 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一日「東京朝日新聞」。

(註二) 四月十六日，田中總裁在政友會臨時大會的演說。高倉徹一「田中義一傳記」下卷，東京，田中義一傳記刊行會，一九六〇年，五四八頁。

(註三) 鈴木貞一的談話，一九六四年三月廿四日。鈴木於六月間，以山梨上將的隨員到北京。鈴木說，聽了山梨之勸告的張作霖非常憤怒而說：「我不幹，我不幹」。

(註四) 馬場明「第一次山東出兵與田中外交」(「亞細亞研究」第十卷三號，一九六三年十月)五二頁。

(註五) 松村謙三「永井柳太郎」，東京，勁草書房，一九六一年，二四二頁。

(註六) 一九二七年五月八日「東京朝日新

聞」。

二、五月二十日的訓令

迨至五月二十日，田中內閣成立以後，第一次的結論性的中國政策方針，纔以極機密電報告北京芳澤公使。

「大觀中國最近的政局，

(一)在南方，以蔣為中心的一派，似很認真地在策劃消滅共產黨，着着圖謀維持秩序。前電第 號和第 號本大臣對駐我國英美代表的談話，乃基於上述的情勢而發。關於南方政權的前途，現在雖無法輕易預斷，但蔣一派如果繼續現在的態度下去的話，最好予他們以『精神上的支持』，幫助其達成政治上的企圖，因此我們應該設法避免蔣一派向武漢開始軍事行動時，張作霖等北方勢力從側面妨礙其行動。與此同時，南北之間如果有成立妥協的可能性的時候，自可適時地促進它，但這主要地還是有待中國人本身的努力，帝國政府或與其關係的人，絕不可以直接參與此事。

(二)在北方，張作霖今日既率大軍進入關內，並在各方面擴張其勢力，由於其體面，很難在半途撤出關外，但又無力逐出蔣吳等各勢力，插足華中方面以擴大其地盤，因此，現在張實陷於進退兩難之窘境，亟需下最大的決心。而要把張作霖從這苦境救出來，實祇有令其放棄武力鎮壓乃政治的要諦這種落伍思想，在其勢力範圍內速收民意，為維繫衆望，必須即刻實施國利民福的方策之一途；對於共產黨的運動

，尤其令張作霖予以嚴格取締。

以上腹案中，關於北方的部份，與張厚畹會面之際，請其轉告張作霖，這是本人對他誠心的勸告，同時對蔣，也表示我對南方的意見。貴官瞭解以上各點以後，為前電○○號會議回國之前，希望張作霖和楊宇霆見面，以我與他倆多年來的友誼的忠言，轉達以上所述我兩項趣旨的『吩咐』，並聽取他們對這吩咐的意見。

又，最近蔣方震與奉天代表張厚畹曾經會面，但該項會面與我政府毫無關係，完全是坂西和松井少將的安排；這個會面的結果，據說南北雙方，就在某種條件下停戰，對共產黨採取共同的政策，亦即在純國民主義的旗幟之下，南北雙方各在其部門將從事清共的大綱交換意見，並將分別報告蔣介石和張作霖。以上請參考。

並請轉告上海和奉天總領事」。(註一) 這個分析，非常冷靜，幾乎沒有野黨時代政友會的那種「積極方策」的色彩。

(註一)田中—芳澤，一九二七年五月二十日發出，外務省縮影軟片，P. V. M. 41. pp. 5-8 關於這個訓令做這樣情況判斷的背景，請參閱前述馬場明的論文五三—五六頁。

中國詩論史

鈴木虎雄 著 洪順隆 譯

人人文庫特二二五 定價四五元

蓋由創作的累積，久之，評論才隨而產生。評論達到可觀的標準，創作乃隨之遷移。

評論家有的是出於作家，有的未必兼有作家的身分。然而，凡是卓越的評論家必善於識別作品的優劣，指摘長短利病，闡明其他作家自身所意識不到的，將其價值和標準垂佈於衆。

信達雅乃譯書之三難，本書譯者素攻國學，復游學東京，譯筆不墮於俗，克存其真，讀者自能書中辨之。

中國是一個詩的國家，隨著詩歌發展，有關詩的理論亦見簡端，尙書舜典有一段話可視為中國詩論濫觴，後如詩品，文心雕龍，滄浪詩話俱見精論。作者鈴木虎雄博士除歷述詩說見解，條理井然外，所論格調、神韻、性靈三詩說，尤有發前人所未發之處。

臺灣商務印書館 發行